

中国人民站起来的伟大的战歌

——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创排过程回顾

本报记者 张婷

对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南泥湾》、《保卫黄河》等革命老歌,大多数中国人能哼唱,这些早在几十年前就风靡全国而传唱至今的歌曲,都是上世纪60年代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的经典曲目。

而这都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作品的诞生绝不是偶然的。1964年,当时的中国刚刚度过三年自然灾害,国内外敌对势力对中国造成的影响也日益减弱,国民经济开始复苏。因此,那年新中国成立15周年的国庆具有了非同一般的特殊含义。为了庆祝这一特别的日子,《东方红》横空出世。

周恩来是总导演

《东方红》舞蹈编导之一的佟兆尧告诉记者,当时《东方红》的创作是受了两个大型歌舞的启发,一是朝鲜的《千里江山》,一是上海的《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特别是周恩来总导演看了《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后,立即决定:在京的文艺团体为骨干,抽调全国文艺精英,搞一台庆祝新中国成立15周年的大型晚会——《东方红》,向国庆献礼。为了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完成《东方红》的排演,周总理亲自担任了组织领导工作。

创作伊始,周总理首先召开了《东方红》领导小组和组织指挥工作小组会议,会上明确指示,《东方红》是以艺术的形式,完整地表现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程,歌颂中国共产党,以宣传毛泽东思想为主题的。周总理对创作内容的每一部分都十分谨慎,均以会议的形式,和创作组一起反复推敲。

《东方红》舞蹈编导之一的孟兆祥提起周总理,一脸佩服的表情。他说,排练的日子每天都能看到周总理,他不仅说话办事雷厉风行,还不摆“大官”架子。当时身为毛泽东文艺秘书的青江观看完第六场《中国人民站起来》的排演后,希望把天安门前的秧歌舞改成京剧舞蹈。周总理尊重他的意见,马上提出修改方案。孟兆祥和京剧院团的同志们接到任务后,两天之内完成了作品。第三天晚上,周总理就来审查节目了。“当时,穿着演出服的我坐在椅子上已经睡着了,恍惚中感觉到一只大手在不停地轻拍我,并且说‘小同志,醒醒啊’”。



中国旅美舞者黄嘉敏,曾在北京舞蹈学院学习、任教,后赴美求学,之后又开始在美国社会教舞,编舞,成了杨百翰大学的舞蹈教授。这么一个生于中国、舞于美国的舞者,长久以来,虽在美国社会生活多年,却总是不能“混灭”她的中国人思维方式,始终都想着如何架设一个中美舞蹈文化交流与沟通的桥梁。不久前,黄嘉敏促成了一项很有成效的中美文化交流合作项目:她带着美国

我睁眼一看,吓了一跳,总理正微笑着站在我身边。我一看表已是深夜3点多。”孟兆祥回忆道。所有演员立即上台表演,这段仅两分钟的演出连续汇报了两遍。周总理看完后,连连点头,并走上舞台,再三向演员们表示歉意和感谢。随后,又立即召开修改会议。周总理主持会议,开场白没有官话,第一句话就是“请同志们说说有什么困难”,一句话说得大伙儿心里暖暖的,也扫除了心里的顾虑,纷纷畅所欲言。周总理对所有的问题,甚至细致到舞台上地毯的使用,都给出了令人信服的解决方案,整个会议不到30分钟就結束了。

周总理不仅关心创作本身,还关心全体演职人员的思想工作。为了让大伙儿熟知中国共产党的艰苦历程,他在人民大会堂做了连续几个小时的党史报告,生动的报告让大家明白了革命胜利的艰辛,对今天的生活倍加珍惜,团结了大家的思想,更激发了大家的演出热情。

甚至,外国友人观看《东方红》,提出如幻灯片的投放、服装等细节问题,周总理都“对答如流”。因此,所有人都承认周总理是总导演。

不计名利的创作组

1964年7月中旬,《东方红》开始创作筹备,中央从全国调集各路艺术精英进京,创作队伍由近百人组成,包括导演组、文学组、音乐组、舞蹈组、舞美组等,每个参与者无私的奉献精神充盈,贯穿了整个创作过程。

“《东方红》创作成功的模式堪称新中国文艺界无私合作的楷模。”孟兆祥说。以舞蹈组为例,所有人亲如一家,在创作上,更是毫无保留地互相帮助。所以,《东方红》的每一亮点,从不属于某人,都是集思广益的结果。如他在创排《过雪山草地》一幕时,开始总想着怎么表现红军与恶劣的自然环境斗争,组内讨论时,大家都认为立意尚浅。坐在他对面的佟兆尧建议以“护旗”这个动词为核心去编舞。顿时,他茅塞顿开:护旗一举多义,一是红旗代表着对军队的指引方向,二是可表现与自然斗争的场景,三是表现了万众一心的革命意志。最重要的是,那时中国革命处于低潮,党内有人怀疑红旗能打多久。护旗的舞段表现的是,在最艰难的时刻,红旗也永不倒。演出效果极好。

音乐组的团结一心,至今回想起来,令人感动。孟兆祥说,当

相遇?这里,让我们看到,有“中”与“美”的相遇,有舞与乐的相遇,有传统与现代的相遇,当然,还有创作者与观赏者的相遇。这个“相遇”,内涵十分丰富。而当人们真正从这里看到了“相遇”的结果,感受到了“相遇”的奇妙,通过“相遇”认识了彼此,增加了对彼此的信任和欣赏,那么,这一切相遇着、化合着,其作用自然就产生了。

然而,对于陌生文化的抗拒心理是一种常态。面对一个新文

黄嘉敏用舞蹈“相遇”

江 东

杨百翰大学的交响乐团与北京舞蹈学院的舞者们合作,在北京保利剧院联袂上演了一场名为《当我们相遇》的音乐舞蹈晚会。

在这台晚会中,黄嘉敏用她“中美相间”的独特思维,为观众呈现了一个由四章组成的现代舞作品——《当我们相遇》。这是由黄嘉敏和另两位中国青年舞蹈编导胡岩和王盛峰共同打造的,他们特别选用了美国作曲家科普兰的交响乐作品,配以杨百翰大学交响乐团的现场伴奏,看上去,实在是新意迭出。

该舞蹈取名《当我们相遇》,创作者的用意十分明了。当“我们”相遇……谁是“我们”?“我们”如何

化体,莫名的恐惧会让人望而生畏从而逃避三舍。我相信,当任何一个个体在进入一个崭新的文化体时,都会遇到同样的疑虑。黄嘉敏在她的舞蹈中,同样也向我们展示了她的疑虑、她的困惑,以及她的顿悟和坚守。舞蹈中,黄嘉敏以“观”“感”“聚”“合”4个舞章为该舞做了一个起承转合的结构,以标题式的主张为科普兰的美国式音乐做了一个形象的解译,用以解释自己的心境。通过这个舞蹈作品,我们深深地领略到了作为一个陌生人,黄嘉敏在融入他文化时所历的复杂心路历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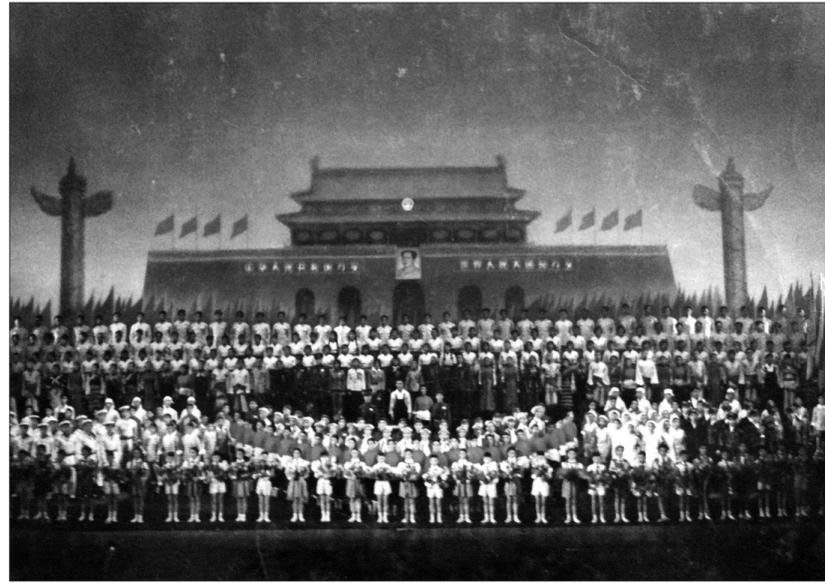
表现上看,这是一个以现代舞的艺术方式为表达基础的舞

时,音乐组的成员皆为远近闻名的作曲家,如时乐蒙、李焕之、李劫夫等,这些老将都不计名利地抱作一团共同创作。如第二场的《井冈山》,第三场的《长征》和第五场的《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可谓是贯穿《东方红》的三大主干歌曲。演出问世后,这3首合唱歌曲迅速风行全国,而这些歌曲的创作过程是现在的作曲家们难以做到的。对于一个主题,作曲家们先分头创作,然后把各自的作品上交组织,组织把这些作品集中编号,不记名,然后开会讨论。会议一般由组长时乐蒙主持,由声乐演员逐一视唱作品,但不公布作者。唱毕,组里所有成员对这些作品评估。由于是不记名,所以大家的评审是公平、公正的,有的说2号作品的头两句节奏好,5号作品中回旋旋律动听……会后,时乐蒙把所有意见归纳,最终几个小时的党史报告,生动的报告让大家明白了革命胜利的艰辛,对今天的生活倍加珍惜,团结了大家的思想,更激发了大家的演出热情。

舞蹈家刀美兰回忆《东方红》还带有少女的甜美与羞涩:“在《东方红》里担任花环舞的领舞时,我才19岁,是东方歌舞团里年纪最小的演员,舞蹈家赵青、崔美善等都是我的姐姐。作为傣族人民的代表登上首都人民大会堂的舞台,为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为全国人民跳舞,真是无比的荣耀和幸福,所以每一场排练我都很激动。”

真情实意的演员

《东方红》里演员的阵容更是强大,除驻京的各个中直文艺团体及总政、空政、海政、北京军区、铁道兵、工程兵歌舞团参加之外,中央军委又将沈阳、南京、广州、济南军区等歌舞团的演员迅速调集北京。1964年8月12日,3000多人的庞大演出队伍开始集中排



《东方红》剧组

练。——以一曲《赞歌》红遍大江南北的歌唱家胡松华谈起《东方红》,十分自豪:“47年前,当我荣幸了中共中央总指挥部传达周总理的指示——为增强新中国诞生的喜庆气氛,在‘伟大的节日’一场里增加一首运用蒙古族音乐风格的男高音独唱曲目。那时,正逢我去内蒙古大草原深入生活返回北京不久,很有创作激情。我连夜写出了《赞歌》,两三天后迎接了周总理、陈毅元帅的审查,他们高兴地一遍遍通过。”“现在出去散步,我经常能碰见当年《东方红》里的‘红领巾’,我虽然不认识他们,但聊起《东方红》,就有说不完的话。他们向我描述毛泽东主席等中央领导人在台下看演出的表情,谈他们还是孩子时参加演出的感受……真是段美好的日子。”

舞蹈家刀美兰回忆《东方红》还带有少女的甜美与羞涩:“在《东方红》里担任花环舞的领舞时,我才19岁,是东方歌舞团里年纪最小的演员,舞蹈家赵青、崔美善等都是我的姐姐。作为傣族人民的代表登上首都人民大会堂的舞台,为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为全国人民跳舞,真是无比的荣耀和幸福,所以每一场排练我都很激动。”

“那时演出条件很艰苦,没有现在这么多种类的高级化妆品,演员所需的化妆品就是三大罐——粉色(粉底)、红色(胭脂)、黑色(眉及眼影)。化妆时,所有人用手抠出一块来涂抹。所以,还不擅长化妆的我经常化得红一

块、黑一块的,被大伙儿笑。抹头发的头油也不是很好用,由于自己的头发太顺滑,很难盘起来。为了固定发型,我就想出用粘信封的胶水抹到头发上的点子。大伙儿又都笑我。为了演出,我们什么困难都能克服。”说到这里,刀美兰笑得很“得意”。

3000多人的演出队伍,无论何时都井然有序,表演时,道具、动作不会有一丝差错。候场时,全体演员一队队整齐地排着,像一支正规的军队。为了鼓舞大家的意志,排练完,负责人还组织演出队互相学习观摩,对表现突出的团队和个人,以快板等形式在队前予以表扬。就这样,在那个物质条件艰苦的年代,全体演职人员在无报酬的情况下,齐心协力,用真情实感奉献出了一台融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为一体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

1964年10月2日晚,《东方红》第一次公演。舞台版的《东方红》共分8场:《东方的曙光》、《星火燎原》、《万水千山》、《抗日的烽火》、《埋葬蒋家王朝》、《中国人民站起来》、《祖国在前进》、《世界在前进》。社会各界及国外贵宾共1万多人观看了演出,全场情绪高昂,掌声久久不息。

“《东方红》是中国人民站起来的伟大的战歌。”舞蹈编导之一的邢德辉如是说,“在建党90周年的日子里,我们再次回顾《东方红》创排过程,是为了回顾和总结历史中那些正确的思想,为了继承和发扬革命精神传统,争取更大的光荣。”

“《东方红》是中国人民站起来的伟大的战歌。”舞蹈编导之一的邢德辉如是说,“在建党90周年的日子里,我们再次回顾《东方红》创排过程,是为了回顾和总结历史中那些正确的思想,为了继承和发扬革命精神传统,争取更大的光荣。”



《东方红》剧组

艺术·温故

第一届全国曲艺会演始末

王 娟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项建设事业获得了空前未有的成绩。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方针指引下,曲艺艺术在新形势的鼓舞下也有了更大的发展,民间艺人也从社会底层逐渐被人民群众所认可与推崇,改变了其社会地位与文化身份,成为人民艺术工作者。1958年8月,轰轰烈烈的曲艺事业以“全国首届曲艺会演大会”的成功举办,奏响民族新曲艺的第一声响彻云霄的震天长鸣。

1958年8月1日至14日,“第一届全国曲艺会演大会”在首都北京召开。共有来自27个省市区及部队的343名曲艺艺人和代表,及88名观摩代表参加了演出。其中包括汉、蒙、古、傣、白、回、满6个民族,组成了27支代表队,共带来了167个曲种和200多个优秀节目。会演以演出和观摩两种形式为主。各代表团分成两批成员,白天观摩、开会和学习,下午和晚上演出,演出形式有剧场、街头、巡回演出以及联欢游园晚会等,地点在长安戏院、文化部礼堂等首都各大剧场。演

出汇集老中青三代演员,既有评书艺人王少堂、山东大鼓艺人谢大玉、扬琴艺人李德才、弹词艺人舒三等曲艺界的老艺术家,也有河南坠子演员郭文秋、天津时调演员王毓宝、四川清音演员李月秋、湖北民歌演员蒋桂英等青年演员。

8月10日晚,第一届全国曲艺会演代表和2万多名观众在北京中山公园举行了盛大的联欢游园晚会。当晚,会演代表分散到公园的12个场地同时进行演出活动,共计100多个节目。节目涉及曲种多种多样,如马增芬的陕西大鼓《金钱板》、王毓宝的天津时调《翻江倒海》、韩起祥的陕北说书《翻身记》、郭文秋的河南坠子《送梳子》、李月秋的四清音《布谷鸟咕咕叫》、侯宝林的相声《戏剧杂谈》等。当晚在场的观众在风景怡人的公园中享受了一场曲艺艺术的视听盛宴。

分代表在怀仁堂再次进行了表演。周总理鼓励老艺人李德才等人好好带徒弟,指示青年演员努力学习。湖北代表团周忠全老艺人感慨地说:“做梦也没想到,我能到北京来唱渔鼓,参加这一次终生难忘的会演大会,并向全国的老前辈们学了的东西……更使我激动的是,我还亲眼看见了敬爱的周总理,他老人家还上后台向我们问好握手,这真是我一辈子的幸福啊!”

曲艺会演引起了首都和各地文艺界的重视与学习。北京市艺术团体的声乐工作者在观看了会演演出后,掀起了向曲艺学习的热潮。会演当年的亲历者常宝华谈道:“四川清音的演员李月秋用四川方言演唱《布谷鸟咕咕叫》,印象很深刻。当时获得了曲艺界、音乐界的演员和普通观众的追捧。节目和唱法经过精心的设计,太好听了。之后,就引起了声乐界演员争相学习,就连美声唱法也向她学习。”

会演期间,除了北京当地团体向曲艺艺人学习以外,上海、天津等地艺术学校也专门派人去北

京学习曲艺。音乐家杨荫浏、张肖虎、王元方、杨大钧等人不但每天观看演出,还在每天上午参加各代表团的分组专题座谈。中央实验歌剧院、中央歌舞团、中央乐团、中央民族歌舞团、广播乐团等单位都派出了大批演员到曲艺代表驻地,学习曲艺节目,曲种涉及清音、单弦、坠子、时调、鼓书等。

8月12日晚,首都11个文艺团体的60多名演员做了一场曲艺汇报演出,展示了会演期间向曲艺代表的老师们学习的曲艺节目。晚会共演出了24个节目,包括岔曲、河南坠子、山东评书、四川清音等10多个曲艺品种。首都的艺术家们通过学习,不仅能够较准确地掌握各曲种的特点,还依照自己的专业特点进行了尝试性的改革和创新,他们的优秀表现获得了曲艺专家和普通观众的广泛好评。

8月14日上午,第一届全国曲艺会演大会在北京闭幕。历时14天的演出随着会演大会的结束而告一段落,然而曲艺之花仍旧在首都和各地竞相争奇斗艳,在人民的心中生根开花。

艺术·视野

走进琴境与诗境

记古琴、古诗词进校园活动

张振涛

如果你能想象,21世纪的演奏家闵慧芬、宋飞拉的二胡与20世纪初刘天华、阿炳拉的二胡完全不一样,就能感受这个行当追求新图变的愿望有多么迫切。可是古琴领域却是另一番景观,我们不但可以想象而且可以确认21世纪的琴家林有仁、李祥霆弹的古琴就是7世纪制造的唐琴,吴钊、龚一弹的古琴就是10世纪宋代琴家手下的古琴,20世纪管平湖演奏的《流水》就是明清两代刊印乐谱上的旋律,也许就能体会到琴学领域保持传统的力量了。

“古琴与古诗词进校园”活动是文化部艺术司主持的“中国民族音乐发展和扶持工程专项基金”项目之一,目的是把古琴、古诗词引进高等院校,提醒莘莘学子对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让代表未来的年轻知识群体认识民族优秀文化,成为认同传统人文精神的“知音”。

2010年10月13日,中央民族乐团“古琴与古诗词演出小组”在西北师范大学音乐舞蹈学院,10月14日在西北民族大学音乐舞蹈学院,12月14日在中华女子学院北校区,2011年5月10日在湖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5月12日在湖南商学院等地,采用小规模“雅集”形式,演出了“古琴与古诗词音乐会”。

音乐会既保留了历代文人画最常见的琴箫合奏形式,也突出了被历代推崇的阮籍七贤两位杰出文人嵇康与阮籍的琴阮合奏形式,更有边抚琴边演唱的琴歌,古琴独奏,自不待言。音乐会的主要节目有:古琴、箫、阮合奏《苏武牧羊》,古琴独奏《流水》、《梅花三弄》,琴箫合奏《阳关三叠》,琴阮合奏《泣颜回》,琴阮合奏《黄云秋塞》,女声独唱古诗词《长相知》(乐府)、《扬州慢》(姜白石)、《凤凰台上忆吹箫》(李白)、《子夜吴歌》、《春光好》等。

中国文字具有天然的音乐美、韵律美,古代诗歌都是通过吟诵念来表达出来的,“勒之金石,播之声诗”,只有这样才能体验诗歌独特的情感内涵和节奏韵律。唱、吟、诵、念是传统读书方式,也是中国文化的经典表现方式。近代以来,赵元任、杨荫浏、朱自清、叶圣陶、俞平伯等音乐家和文人都提倡吟诵,近年来学者叶嘉莹、韩经天,更是提倡推广,2008年,“常州吟诵”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秦德祥编辑出版《吟诵调》。为了响应中宣部、文化部关于在全国范围开展“读诵中华经典”的号召,音乐会推广“美读”形式。

我们感到,即便是传播方式越来越方便的今天,古琴之名和琴箫音响依然遥不可及,大部分非专业圈的学生感到陌生。他们搞不清七根弦的古琴与十三根弦的古筝之间有什么区别,搞不清琴曲《高山流水》与琴曲《渔舟唱晚》有什么风格差异。其实,分别和特征明摆着,但就是没见过,了解和亲近便无从谈起。

虽然走到哪里都会获得年轻学子的广泛共鸣,但也到处遇到不能理解古琴的疑虑。除了普及

活动稀少外,我们也坦然告诉他们学界谈及的“人生三部曲”并从中体悟儒、道、释三重境界的启示:早年儒家,治国平天下,英雄气概不可一世;中年进入道家,懂得静虚,即使壮心不已,也已外儒内道;晚年参透人生,步入佛境。如果把人生三境借转到音乐上也可比附为:早年摇滚流行,繁管急弦,新声变律,嗜之如命;中年返璞归真,始解丝竹古琴;晚年天人合一,更能近亲天籁。每个年龄有每个年龄的音乐,不到岁数,强扭的瓜也不甜。年轻人血气旺、性子急,满耳急速,听不到简单。所以不用催促,到了心性减缓的年纪和境界,自然会来倾听自己的心声,那时,你让他鼓捣架子鼓、迪斯科,他都不去。古琴传了三千年,不差等你几十年,年轻人,琴放在那里,等你来倾听。

20世纪初,琴学蛰伏民间,成为乐坛上不折不挠的寥落星辰。但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大批杰出琴家前赴后继,重整旗鼓,管平湖、查阜西等,把知音故事的载体《流水》,变为脍炙人口的实际音响。琴歌是诗歌载体之一,“朱弦疏越,一唱三叹”,经过查阜西、王迪等人的收集打谱,得以普及,可以说:太古遗音,赖以是传,广绝响,因此复闻。西式教育不但灼烧了琴学的过去,也焚毁了吟咏诗词的过去,抽调了诗词歌赋得以传之式样。只要提供给年轻人接触琴乐和吟咏诗词的机会,一定会换来下一代的情感体验。

中央民族乐团 “古琴与古诗词进校园”活动